

# 白璧德與中國自由派的文化觀

莊錫華

---

**【提要】** 現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文化思潮對思想文化界占主導地位的激進主義是一種有力的制衡，它的存在給以激進主義為主調的現當代文化與文學景觀增添了色彩。學衡派與新月派是自由派的中堅，自由派學人因涉洋留學接受了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文化理念，並因此能夠從中西文化多角度比較的學術層面講述維護已有文化之必要的道理。學衡派反對全盤西化，批評浪漫主義的混亂，張揚學術民主，對激進主義取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中國自由派學人的局限也極明顯，他們不懂得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有通過發展獲得解決，固執的精英意識使他們與現實、與大眾存在較大的隔閡。進入21世紀後，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在確定我們的文化發展戰略時，中國自由派的文化精神與論學立場值得引起重視。

**【關鍵詞】** 白璧德 自由派 文化精神 文學觀念

**【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4 - 0071 - 08

---

五四時期，當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致力於批判傳統文化、力主“全盤西化”、推崇個性自由的時候，大洋彼岸的白璧德正與他的同胞就西方文化出現的問題進行言辭犀利的論辯。白璧德批評盧梭、培根濫情的人道主義和自我膨脹的理性主義，強調要用紀律與規訓進行自我約束，反對浪漫主義的煽情取向。撇開白璧德學理主張的對錯，白氏的學術勇氣，孤軍奮戰的人文情懷給了他的中國學生——中國自由派文化人極大的鼓舞，他們在挑戰激進主義傾向、同左翼作家論戰中秉持的正是乃師求取真理時的義無反顧。自由派人士早已作古，看待這段歷史的心態也復歸於理性與平和，但當我們回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自由派與激進主義聲色俱厲的激辯時，仍然會獲得不少有益的啟示。

生活活動於五四前後的自由派文化人早年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薰陶，在瞭解白璧德對現代化的批判性反思後，有了更大的學術自覺，致力於揭明與維護本民族文化中的積極因子，提醒人們注意西方文化的複雜性，強調文化現代化並非西方文化的一元化，引進西方文化要有審慎選擇的眼光，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發展也因此有了白璧德新人文主義這個元素。

進入20世紀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邁上了現代化發展的快車道，但物質財富的迅速積累，並沒有帶來精神昇華的福音，戰爭、殺戮頻頻出現在以理性、文明相標榜的國度裡，現代科技發展的成果被直接用於血腥的戰場，用於人類自己的互相殘殺。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的情形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一方是錦衣玉食、香車寶馬；一方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社會對立，矛盾突顯。這些社會現象引起了西方一部分人文知識分子的注意。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便是對西方現代化進程早期社會病像思考的產物。孫尚揚說：“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是西方現代思想史上最為奇特的文化守成主義。它不是貧弱之國的知識分子出於自卑而又要自衛的文化心理而產生的對自己可以引為自豪的傳統之精髓或情致的認同或顯耀。勿寧說，它是生於富足逸樂而又常懷千年憂思的知識分子對近代西方功利主義和浪漫主義所帶來的道德淪喪和人性失落的理智反思。”<sup>①</sup>白璧德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形成了理性的傳統，其核心是強調人的價值，強調個性的自由，這些觀念雖然推動了人類進步與社會發展，但個人主義惡性膨脹，也造成了西方社會的失序與混亂。白璧德說：“文藝復興第一時期佔據主流的是一種解放運動——對感官的解放，對才智的解放……”他接著分析說：“他們那種用來打破中世紀傳統鐐銬和束縛的熱情，他們那種治癒了自然本性與人文本性之間長期不調和之後所表現出的生氣勃勃，一時蒙蔽了對高雅和選擇的需求……這種個人能力的無序與無紀律的表現，這種在將自由的好處與管束的好處相比較時對前者的過分強調，都給擴張時期帶來了某種特殊的惡。無政府主義式的孤行專斷和自我放縱增加了……”<sup>②</sup>白璧德清楚地認識到人的地位的提升與個性擴張在打破中世紀封建束縛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但同時也給西方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孤行專斷”與“自我放縱”。因此，白璧德與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崇尚民主與自由的主流意識唱起了反調，強調紀律與規訓，強調約束與管制，要在發生了嚴重衝突的社會進行理性的重建，回歸到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節制、有序的發展軌道。

白璧德分析了近代西方工具理性的創始人培根的思想，批評其人格的雙重性：“因為過於尋求自然法則，他忽略了人的法則；在尋求獲得對事物的控制時，他失去了對自己的控制”<sup>③</sup>。失去了對人自己的控制必然導致個體間的衝突、人與社會的衝突和人與自然的衝突。白璧德意識到：“當人過於被權力和成就吸引，又被自身脾性左右時”，他會“變得失去體面”。失去體面的原因便是貪欲的膨脹。白氏通過對一些歷史人物的分析認為，在人身上往往體現為“傑出能力與瑣屑的卑鄙的混合”，因此更堅定地認為紀律與規訓是防止人格失控的一劑良藥。理查德·M·甘博認為無限制的權力欲取代社會關係中的倫理控制是那個時代最普遍的社會病症，而新人文主義就是要來救治資本主義的現代病的。甘博說：“與這個標榜民主、進步和人道主義原則的時代看起來頗為矛盾，無論是現在還是當時，都有人爭論說，儘管有著19世紀那些卓越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爆發了，這實際上標誌著對人道主義衝動最苦澀的背叛。白璧德逆當時的時代潮流，做出了針鋒相對的回答。他認為，戰爭的到來恰恰就是因為這種擴張的理想主義……對白璧德來說，這意味著當前國際混亂的最終根源乃是在個人內心裡氾濫著的道德混亂。”<sup>④</sup>

白璧德對西方世界精神生態的分析是深刻的、超前的。他還特別注意中國問題，十分關注中國正在發生的新文化運動。白氏一方面對“中國進步派之目的”深表同情，以為“中國必須有組織，有能力，中國必須具有歐西之機械，庶免為日本與列強所侵略”，“中國亦須脫去昔日盲從之故俗，及偽古學派形式主義之牽鎖”；另一方面又提醒道：“中國在力求進步時，萬不宜效歐西之將盆中小兒隨浴水而傾棄之”<sup>⑤</sup>。

中國自由派學人在現代中國文化舞臺上的獨特表演告訴我們，歷史有時也會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白璧德指稱的西方世界的現代病，在當時的歐美是一種超前的認知，對於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後的中國來說，更像是天方夜譚。如果沒有這樣一批中國學子陰差陽錯地投入白氏門下，學成歸國後竭力宣揚乃師的理念，現代中國思想界又怎會發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與學衡派、左翼作家與新月派如此熱鬧的爭論呢？有了白璧德，中國現代學術文化似乎多了幾分熱鬧。

中國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大多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梅光迪生於江南文化重鎮徽州，是北宋著名文人梅聖俞之後，幼承家學，還曾應過童子試。吳宓雖然籍隸陝西涇陽，但也是當地的望族。陳寅恪生於官宦之家，自己又讀書行路，在學界頗具資望。可見學衡人物絕非魯迅所說於舊學並無門徑。後來這些人又為當時的留學潮所裹挾，蹈海出洋，學習西方的文化學術。這樣的學歷為他們提供了思考文化、學術問題的國際視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梅、吳以及稍後的梁實秋等人，入籍哈佛，成為對現代化充滿憂思的美國新人文主義者白璧德的及門弟子。有了這樣一層關係，自由派學人在表達他們關於文化、學術問題的意見時多了幾分底氣，不像民初林紓、章士釗等國粹派，局促在偏狹的線裝書世界裡建構自己顛頂狹隘的文化學術理念。自由派雖然也百般維護傳統文化，但在倡導守成時，也會將自己的文化視線投向變動中的世界，從人類共同的文化創獲中鍛煉新的文化觀點，據此重新評估本民族文化的傳統。這樣，他們就在一個特殊的時代扮演了雙重角色：民族文化傳統的守成者，異域文化的詮釋者，致力於排除現代激進主義的消極影響，成為中國現代思想文化領域裡的重要一維。

## 二

堅持學術理性，反對文化激進主義，是中國自由派學人學術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國現當代思想文化領域有一個以激進主義、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潮為主體的基本格局。激進主義是戰爭動亂時代的產物，它牢牢地掌握著話語主導權，激進主義“尋求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植根於革命的、普遍的意識形態信條”<sup>⑥</sup>。激進主義雖然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其認識局限與消極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激進主義在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上均持激進的立場，宣揚革命性的、整體的變革，否定文化傳統，主張全盤西化，而在審美領域，激進主義只注意藝術的宣傳作用，忽略藝術欣賞價值。激進主義來勢兇猛，影響深遠，建國後，激進主義與虛假浪漫主義相互配合，在創作中宣揚盲目的樂觀情緒，塑造脫離現實的英雄人物；在對待傳統文化的問題上，激進主義標榜“厚今薄古”，全面否定文化傳統，鼓吹越是精華越要批判，具有強烈的文化虛無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保守主義是激進主義的對立物，但它罔顧時代潮流，身處發生激變的時代卻要固守成法，蹈襲舊路，不思進取，堅稱祖宗留下的東西最美好、最優秀，主張全盤吸收繼承，先天喪失了歷史的合理性，不足以挑戰激進主義的權威。只有自由派學人的學理論述，才使激進主義遇到了有力的制衡。

鴉片戰爭之後，列強入侵，落後挨打，催化出國人的憤激情緒，制器、制度與文化均不如人的認知，讓中國的文化人痛心疾首，遂自創祖墳，挑戰本民族的文化遺存；轉過身來向西方文化表達虔誠的敬意。激進主義思維方法極端，只知顛覆，不知建構，宜受庸俗社會學的利用與擺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將西方的個性自由、功利意識視為對付中國封建社會三綱五常的禮教秩序的利器，其文化言說充滿了崇尚個性、強調自由的內容。五四對封建禮教的批判仿佛是在一個不同的時空環境裡複製法國啟蒙運動時盧梭對古典主義“禮儀”的批判。盧梭認為古典

的“禮儀”壓制了個性的自由，“是以乏味的‘尊嚴’為名扼殺了心靈的呼聲”。<sup>⑦</sup>盧梭批評古典主義的理性“壓制個體感受”、“約束情感”<sup>⑧</sup>，他“高度讚揚本能對常規生活所具有的優越性”<sup>⑨</sup>，盧梭與培根都要求釋放本來受到理性制約的欲望，反對約束非理性的個人衝動<sup>⑩</sup>，從而確立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白璧德告訴他的中國學生，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已導致社會的嚴重失序，萬不可照搬，貽害有自己悠久歷史的文明。由此可知，激進主義的西方認知與中國自由派學人有較大的落差。留學歐美的中國自由派的重要成員結合中西方社會的現實對白氏的見解進行驗證，產生了深深的共鳴。全盤西化、將被西方有識之士視為禍水的東西當作寶貝引進，在中國自由派學人看來，必定會在中國引起新的混亂。

中國的自由派學人對文化激進主義的危險有很深的體認，在《論新文化運動》一文中，吳宓說：“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東西聖賢之所教導，通人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其取材則惟選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視為糟粕、為毒醜者，舉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體。其行文則妄事更張，自立體裁，非馬非牛，不中不西，使讀者不能領悟……值今日中國諸凡變動之秋，群情激擾，少年學子熱心西學，而苦不得研究之地、傳授之人，遂誤以此一派為宗師，為惟一之泰山北斗，不暇審辨，無從決擇，盡成盲從，實大可哀矣。”<sup>⑪</sup>吳宓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雖然不無道理，但行文用語過於偏激，容易遭到持平之論的詬病，更無論新派人士的激烈反彈。感覺湯用彤《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對時學淺陋的分析更為理性，他說：“時學淺隘，其故在對於學問猶未深造，即中外文化之材料，實未廣搜精求，舊學毀棄，固無論矣，即現在時髦之東西文化，均僅取一偏，失其大體。讀今日文章，必以為沙士比亞已成絕響，而易卜生為雅俗共賞；必以為柏拉圖已成陳言，而柏格森則代表西化之轉機，蒸蒸日上。”<sup>⑫</sup>

現在看來，大陸之前現代文學史著把中國現代自由派學人描寫成一般地反對新文化運動是片面的。自由派承認新文化建設的合理性，只是反對全面否定民族文化傳統的激進傾向。梅光迪坦承：“夫建設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sup>⑬</sup>吳宓也說：“吾之所以不嫌於新文化運動者，非其新也，實以其所主張之道理，所輸入之材料，多屬一偏……或駁吾為但知舊而不知有新者，實誣矣。”<sup>⑭</sup>總的來看，自由派對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秉持的是一種建設性的立場，他們認同白璧德對東方文化的評價，認為：中國文化延續數千年，其中“必有可發揚廣大，久遠而不可磨滅者在”。白璧德否認在思想文化領域存在適用於一切民族與地域的“一般標準”，本此，不同民族雖然應當在文化發展中互相借鑒，但最終還是要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 三

學衡派適逢五四時期全盤西化的激進取向，因此關注本民族文化的繼承，新月派則因為自己的文學興趣和面對左翼文藝的崛起，對激進主義與浪漫主義合力造成的文壇混亂有更多的論析，他們倡導情感表達的理性與節制，以抵制激進主義在文學領域裡的表現——浪漫的失序。

文藝復興運動後西方文化格局實現了重組，人性人道主義成為強勢話語，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審美結緣本來就是常態，浪漫主義取向因而有了更大的擴張。白璧德厭惡西方思想文化界的混亂，崇尚自然本性並有煽情傾向的盧梭成了白璧德重點清算的對象。白璧德懷著新人文主義的現代憂思指責盧梭：“即使我不比別人優秀，那麼我至少是與眾不同的”，不只是矯情，也是一種個性的偏執。<sup>⑮</sup>白璧德指出，19世紀目睹了偏執個人主義者群體的崛起，尤其在從衣著這樣的

細節到精緻化自身情感等等一切事情上，他們都努力使自己和市民大眾區別開來。他們在追求精英和創新事物時離正軌漸行漸遠，這不僅顯得偏執古怪，而且也是病態的。<sup>⑭</sup>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普羅文學興起，激進主義與文學浪漫主義相互配合，形成巨大聲勢。部分普羅作家罔顧大眾的審美需要，熱中於政治訴求的表達，缺乏提升作品審美品格的自覺，只知用狂熱的口號、稍加點綴的“革命加戀愛”來呼應時代的要求。這種濫情的“一團糟”的現象、這種“不守紀律的自由活動”與梁實秋偏向於理性的審美取向格格不入。梁實秋說：“浪漫主義……最喜歡的就是那蓬蓬勃勃的氣象，不守紀律的自由活動。”<sup>⑮</sup>不守紀律、挑戰權威正是白璧德對盧梭之後浪漫主義思潮的批評。白璧德說：“盧梭以感情為名，領導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抗一切權威的鬥爭”，盧梭欣賞的是排除了約束的“自發性”<sup>⑯</sup>。梁實秋批評浪漫派作家的“任性”，他說：“現代中國文學，到處瀰漫著抒情主義。”<sup>⑰</sup>五四以後的新文學，“處處要求擴張，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同鐵籠裡的猛虎一般，不但把禮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監視情感的理性也撲倒了。”<sup>⑱</sup>他用調侃的口吻揶揄浪漫主義：“浪漫主義者對於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傷感，愈把自己的過去的生活說得悲慘，自己心裡愈覺得痛快舒暢。離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寫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塊手指，便可敘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殺未遂；晚飯遲到半小時，便可記錄自己如何如何的絕粒。”<sup>⑲</sup>在同激進主義文學思潮進行論辯時，梁實秋吸收了中國傳統文論關於情理關係的思辨，主張從質與量兩個方面實現對情感的控制，即“要考察情感的質是否純正，及其量是否有度。”<sup>⑳</sup>在中國的傳統文論中，孔子是較早關心文學情感純度的先哲，梁實秋關於情感質的“純正”的討論與孔子“溫柔敦厚”的詩教理念在價值取向上極其相似，孔子欣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講求的正是情感質的“純正”；而情感量的“有度”，也與儒家“發乎情，止於禮儀”聲氣相通。梁實秋一直堅定地排斥浪漫主義，他認為：文學的力量，不在於開擴，而在於集中，不在於放縱，而在於節制。在這些意見裡都能看到白璧德思想的影子。

新月派高調倡導審美理性，實際是他們不滿文學領域內受激進主義影響的濫情時弊投下的一劑猛藥。主張藝術創作中克制情感的表現，肯定創作過程應受理性的制衡，也是新月派另一位重要人物聞一多堅持的立場。他強調藝術的形式意義以實現對感情表達的制約，形式其實就是審美的規範，藝術表現應當接受形式的制約，他的所謂“戴著鐐銬跳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聞一多對郭沫若五四時期的詩歌創作多有保留，原因是他的詩作一味“受創似的哀叫”。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五四新詩，響徹了反帝反封建的呼號，表現了詩人亢奮的愛國情懷和叛逆反抗的時代精神，引發了詩壇的震動。但這類新詩大多由吶喊串聯成篇，文字缺乏錘煉。受其影響，“受創似的哀叫”響成了一片，看得、聽得多了，不也會讓人麻木乃至生厭。作為具有創作經驗的詩人，聞一多認為詩是“做”出來的，這個做其實就是讓情感表達符合審美規範。秉承此立場，聞一多批評郭沫若那種隨意吞吐情感的創作方法：“郭君是個不相信‘做’詩的人，我也不相信沒有得著詩的靈感者就可以從揉煉字句中作出好詩來。但郭君這種過於歐化的毛病也許就是太不‘做’詩的結果。”<sup>㉑</sup>

#### 四

與白璧德一樣，中國的自由派學人也以精英自詡，認同文學與學術是少數人的事，反對在思想文化領域裡搞群眾運動，並力倡學術平等，學術自由。

白璧德認為整個社會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擁有自律與克制的自覺。實現人類的道德重構的任務，必須由“能洞悉人類古來多種文化之精華，涵養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學者或君子”來承擔<sup>④</sup>，由這些人來辨別與擇取已有文化中普遍永恆之人文價值，建立能與問題多多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體系。白璧德推崇有“許多的思考，深刻的反思，以及睿智的、強有力的和能夠協調各方的頭腦”<sup>⑤</sup>，其輕視一般大眾的意識彰明較著。中國的自由派完全接受了白璧德“以少數賢哲維持世道”的精英意識，在他們看來，只有少數社會精英才能從事文學與學術等專業性極強的工作，梅光迪說：“真正學者，為一國學術思想之領袖、文化之前驅，屬於少數優秀分子，非多數凡民所能為也。故欲為真正學者，除特異天才外，又須有嚴密之訓練，高尚之精神，而後能名副其實。”<sup>⑥</sup>又說：“學術為少數之事，故西洋又稱智識階級為智識貴族。”並據此批評新文化運動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推行他們的文化主張：“彼等以群眾運動之法，提倡學術，壟斷輿論，號召黨徒，無所不用其極，而尤借重於團體機關，以推廣其勢力。”<sup>⑦</sup>梁實秋在與左翼作家進行文學階級性問題的論辯時也說：“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的天才的創造。科學，藝術，文學，宗教，哲學，文字，以及政治思想，社會制度，都是少數的聰明才智過人的人所產生出來的。”<sup>⑧</sup>在文學批評問題上，梁實秋重視的也是專家的意見，他說：“文學批評是以批評家為單位，而不是以民眾為單位，一般的民眾可以規定文學作品的市價，但是，他們沒有嚴正的鑒別力，不能給文學作品以批評的價值……只有文學批評家的批評才是批評的正宗，批評家的意見無論其與民眾的品味是相合或相反，總是那一時代的最精到的意見。”<sup>⑨</sup>

五四新人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大搞群眾運動，激進主義呼朋引類，主宰著一個時代的文化走向，大大壓縮了自由派學人自由建言的空間。自由派學人因此認為堅持學術平等、學術自由才能有效地壓制激進主義的氣焰。對於這些在歐美習得了思想自由、人格平等等新式學理的人來說，沒有進行公開、公平的論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便將自己說成是真理的代行人是不能接受的。梅光迪說：“彼等不容納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獨尊之慨。其論學也，未嘗平心靜氣，使反對者畢其詞，又不問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謾罵，令人難堪……其罵人也，或取生吞活剝之法，如非洲南洋群島土人之待其囚虜；或出齷齪不堪入耳之言，如村嫗之角口。此風一昌，言論家務取暴厲粗俗，而溫厚慈祥之氣盡矣。其尤甚者，移學術之攻擊，為個人之攻擊。以學術之不同，而涉及作者本身者，往往而有。”<sup>⑩</sup>由此可見，挑戰激進派文化人的做派也含著學術平等的訴求，這也是自由派學人在國人爭相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倡言全盤西化的時候，甘冒鋒矢，以亢奮的熱情報告西方文化的真相、提倡融合中西、漸進變革的原因。近年來國人討論學術規範，普遍認為學術論壇應該自由建言，不能搞排他性的話語霸權；認定學術研究領域不適用少數服從多數，不能搞多數的專政。這裡當然包含了對學術思想領域裡多數壓服少數的非理性常態的反思，而自由派的相關論述也因此突顯出借鑒的價值。

概括起來，中國的自由派學人在關於現代學術精神的建構問題上主要表達了這樣幾個觀點：第一，學問家應當清除功名心。學問家不應做功名之士。梅光迪說新派學人：“其於學問，本無徹底與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為功利名譽之念所驅迫，故假學問為進身之階。”<sup>⑪</sup>在學術人士看來，做學問就是求知，與功利名譽風馬牛不相及。梅光迪認為，學問家應當耐得住寂寞，“學問家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報酬。故其畢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輕出所學以問世，必審慮至當，而後發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後成一書。”<sup>⑫</sup>梅氏認真踐履了自己的主張，他一生治學，身後他的學生想收集遺著，輯錄成集，居然因缺乏必

要的厚度而作罷。第二，強調學問家是專門家，反對誇誇其談，輕率地在陌生的領域發表意見。梅光迪批評有人將學問當作“趨時投機”的行為，未作“切實探討”，便隨意發言，“出之甚易”。他對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涉獵多個領域，處處佈局表示反感，說他們“以一人而兼涉哲理、文學、政治、經濟者，所在多有。”<sup>⑤</sup>隨著學科的細分，產生蘇格拉底那樣的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五四時期許多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在多個學術領域內發文章、作講演的事往往而有。陳獨秀出入於政治、哲學、倫理、文學等領域；李大釗的文章關涉文化學術、政治社會、國際時評。這與學衡派的學問專業化的理念相去甚遠。第三，主張學術與政治分割，強調勿以政治手段從事學術。梅光迪認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以來，“人性莫不喜動而惡靜，樂趨乎呼囂雜遯、萬眾若狂之所為，而厭平淡寂寞。”在他看來，聚眾罷學、結隊遊樂，熱鬧而有趣，遠勝於靜室講習，埋首故紙。但學術研究本來就是耐得住寂寞的人的生活選擇。他特別批評了學術界的某些人“利用群眾心理，人性弱點，與幼稚智識之淺薄，情感之強烈，升高而呼，如建瓴而瀉水，以遂其功利名譽之野心而已。”稍後梁實秋與左翼作家爭論的焦點也是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強調文學審美特徵、反對文學淪為政治宣傳是梁實秋在論辯中表達的主要觀點。第四，反對以門戶之見、黨同伐異的方式操弄學術。梅光迪對不良學人的手段深惡痛絕，他說：“彼等固言學術思想之自由者，故於周秦諸子及近世西洋學者，皆知推重，以期破除吾國二千年來學術一尊之陋習。然觀其排斥異己，入主出奴，門戶黨派之見，牢不可破，實有不容他人講學，而欲養成新式學術專制之勢……故彼等對於己之學術，則頑固拘泥，偏激執迷。對於他人學術，則侵略攻伐，仇嫉毀讎。若假彼等以威權，則焚書坑儒與夫中世紀殘殺異教徒之慘禍，不難再演，而又曰言學術思想自由，其誰信之。”<sup>⑥</sup>

## 五

中國的自由派學人圍繞文化與文學的學理論述內容豐富，且多有裨補時闕的學術自覺，對現代文化學術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有益的意見，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取向因此遇著了有力的制衡。受白璧德新人文主義的影響，中國自由派文化人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負面因子有較多的警惕，秉持學術理性，強調文化發展中西兼取的路向，反對對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摒棄學術文化領域內的超思維、非學術的強制，其論旨的合理性自不待言。遺憾的是自由主義思潮一直被視為保守主義的幫兇，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改革開放以來，近現代自由主義思潮終於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徐友漁認為自由主義的學理言說已有百餘年的歷史，梳理20世紀的思想文化的歷史，聽不到自由主義者的聲音是極不正常的。<sup>⑦</sup>對自由主義思潮的特徵，學界也做出了相應的概括，即抨孔、提倡科學、追求民主、崇尚自由、傾向進步等；有人作了更具哲理性的歸納：在個人自由與社會群體的關係中強調個人與團體的平衡，在社會漸進與激進革命的選擇中主張以改良為手段，在科學探索與宗教信仰的對抗中鼓吹以實驗為例證，在文化多元化與思想一統中趨向理性的選擇。概括地講，現代自由派文論也有這樣幾個特點，這些特點都反映出持論者的中間立場：第一，反對激進革命，主張漸進改良。第二，思想方法上主張調和持中。第三，重視文學的審美特徵，強調文學應在審美的基礎上發揮其社會作用。這些論析對於我們認識近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助益極大。總起來看，自由派人物雖然被戰爭動亂極大地壓縮了活動的空間，在思想文化界長期居於弱勢，不時受到居於強勢的激進主義思潮的蠶食、排擠，但自由主義的學理秉持合乎學術理性，不是能夠隨便擊垮的，自由派學人頑強地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達自己的意見，讓人們聆聽到落

寞文苑中新的不同的聲音。其所表達的文化立場尚能在一定範圍內影響當時的文化走向，不能不說是一種貢獻吧？

中國的自由派學人當然也有自己的認識局限。譬如，學衡派批判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傾向時完全避開了文明進步這個時代要求，他們臚陳西方社會的現代病時，罔顧現代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的實際利益。現代化畢竟是人類進步長途上邁出的關鍵一步，這一點任誰也抹殺不了的。對於深陷於貧困落後的中國來講，拒絕現代化，無疑是拒絕進步、拒絕發展，只能將一個處於激烈競爭的時代、尋求復興的民族推向絕路。毛澤東曾經說過辯證法一切以現實的條件與情況為轉移。白璧德對當時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及由此開出的治病藥方是否一樣適用於飽受封建專制之毒的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問題。當時的中國，人民的基本權利時常受到嚴重的侵害，在這樣的國度中不講民主、自由，不講人的解放、不造專制制度的反，而一意提倡規訓、紀律，其立足點顯而易見沒有站在受壓迫者一方。中國的自由派文化人昧於國情，雖然發起聲來頭頭是道，不少時候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只有在現代化進程中獲得解決。我們不能誇大西方社會的現代病，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現代化是人類發展途程上的一個必經的階段。不患寡，而患不均，低水平基礎上的和諧不是人類應當追求的目標。此外，自由派學人缺乏普世情懷，自以為是，在反對激進主義的話語霸權時又企圖建立自己的話語霸權，罔顧大眾的文化的、審美的需求，否定新文化運動所做的廣泛的啟蒙工作，對喚起整個民族的覺醒毫不在意，這樣的局限豈是可以隨意付之一晒的。

①②④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序》，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1頁。

②③⑩⑫⑮美國人文雜誌編：《人文主義：全盤反思》，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9~10、26、32頁。

④甘博：《國際主義的“致命缺陷”：白璧德論人道主義》，美國人文雜誌編：《人文主義：全盤反思》，第61頁。

⑤胡先驕譯：《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說》，南京：《學衡》，1922年第2期，載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序》，第39頁。

⑥艾森斯塔特：《反思現代性》，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59頁。

⑦⑧⑨⑮⑯⑰白璧德：《文學與美國的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14、114、117、136、140、114頁。

⑪⑭吳宓：《論新文化運動》，南京：《學衡》，1922年第4期，載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第78頁。

⑫湯用彤：《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南京：《學衡》，1922年第12期，載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序》，第100頁。

⑬⑰⑳㉑㉒㉓㉔㉕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南京：《學衡》，1922年第1期，載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第71頁。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梁實秋：《梁實秋全集》，第1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第230、42、42、44、41~42、309、126頁。

㉑聞一多：《聞一多文集》，海口：海南國際新聞出版社，1997年，第102頁。

㉒梅光迪：《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南京：《學衡》，1922年第4期，載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序》，第138頁。

㉓㉔㉕梅光迪：《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南京：《學衡》，1922年第2期，載孫尚揚主編：《國故新論·序》，第130頁。

㉖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第272頁。

**作者簡介：**莊錫華，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廣東深圳 518060

**[責任編輯 陳志雄]**